

中國當代劇作家研究

第二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话剧艺术研究丛书

中国当代剧作家研究

第 二 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主编

本辑选题：中杰英、王承刚、王培公、刘川、刘树纲、
白峰溪、丛深、李杰、李恍、邢益勋、许宏盛、沙叶新、
沈虹光、陈健秋、所云平、赵国庆、高行健、梁秉堃、谢民、
魏敏、方洪友

文化艺术出版社

话剧艺术研究丛书
中国当代剧作家研究
第二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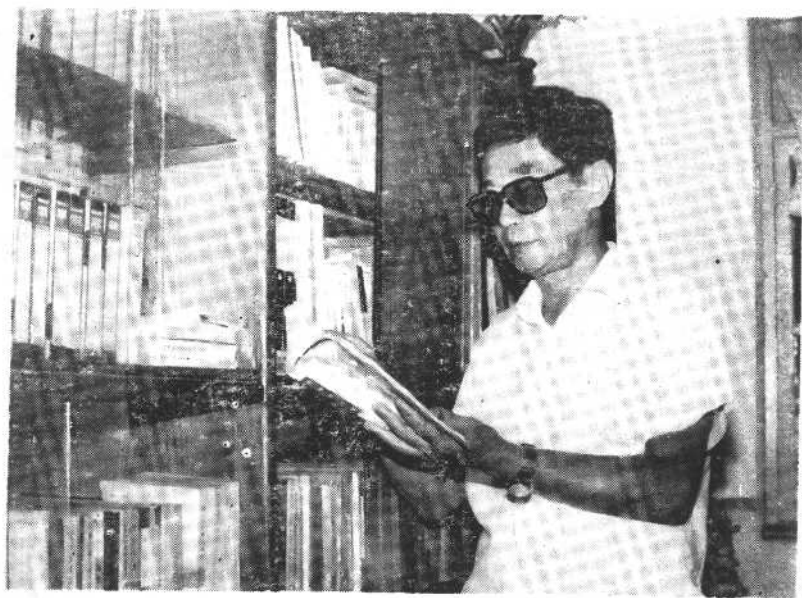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75字数271,000插页6

1989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0,900册

ISBN 7—5039—0356—2/J·102

定价: 5.70元



谢 民

王 培 公





高行健



沙叶新



方洪友



中杰英



所云平



刘
川



许宏盛



李杰

刘
树
纲



魏
敏





王承刚



邢益勋



白峰溪



李悦



赵国庆



陈健秋



沈虹光



丛深



梁秉堃

出版说明

建国三十六年来,我国话剧艺术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剧作家。他们创作的大量优秀话剧剧目,以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吸引了、感动过广大的观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剧作家们以其辛勤而出色的劳动,在中华民族的沃土上,结出了话剧艺术的丰硕果实,使中国话剧艺术以其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创作经验,对于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新局面,攀登戏剧艺术的新高峰,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很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的。

我们编纂这套《中国当代剧作家研究》,就是试图对我国当代话剧作出过贡献的剧作家,作一些分析、研究,以期探讨和总结他们的创作经验,推动当前话剧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并借以及时地搜集和保存珍贵的艺术史料。

本书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运用马列主义的 美学 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剧作家的艺术成就和创作个性,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认真的探讨。对于有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和看法,间或存在一些不同的见解,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我们尽量保留作者的意见。我们视稿子成熟情况先后发稿,分辑出版。

在本书编辑中，曾得到有关剧作家和戏剧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我们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容或存在疏漏错误，殷切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本辑由陈美英、李一波同志负责编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1987年10月

97/6/07

序

凤 子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当代剧作家研究》，约我写序，理由是我和这些剧作家比较熟悉。

第二辑选编研究的剧作家有二十一位，除个别几位是五十年代的剧作家外，绝大多数都是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党的双百方针重新得到发扬的七十、八十年代出现的新人。

从五十年代起我就从事戏剧创作的组织工作，到一九八三年春离休（当然文化大革命十年除外），我是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话剧作品的读者和观众。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的剧作家不止是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剧作家我认识的也不止这二十一位。

为果说熟悉，因为从建国以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和剧作家们有着同样的经历。新中国建立后，从历次政治运动和文艺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和剧作家们有着同样的欢欣、同样的惶惑、同样的苦闷和追求。由于经历相同，我对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剧作家的思想感情有所理解，但是并不深知，所谓熟悉也是比较而言。因此要为本集子写序，我深感难以胜任。

因为推卸不了，同时感到出版这本集子的现实意义，作为对话剧创作历程的回顾，对话剧创作的发展希望能起点推动的作

用，现就作家的任务和时代的关系，谈点个人的粗浅感想。

中国话剧史从春柳社始，迄今八十年了，以话剧定名为一个剧种始于洪深，也已过了半个世纪。话剧的广泛开展源于学校的业余剧团，到三十年代我们党领导下的左翼剧联时期，话剧已成为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号角，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反帝救国运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无论是来自学院的或来自民间的剧作，无论剧作的形式是悲剧、喜剧、或社会问题剧，都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的呼声。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或在抗日战争的堡垒延安、各解放区以及敌后和沦陷区的上海，话剧都有力地宣传了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和独裁。教育了人民、鼓舞了士气。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时进步文化界领袖郭沫若写出了多幕史剧《屈原》，借历史故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伸张了人民的爱国正气。《屈原》的演出轰动了整个抗日后方。解放后重演时，它仍然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屈原》还曾在苏联、日本先后演出，也都获得好评。同样，曹禺写的深刻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中国社会生活面的《雷雨》、《日出》，至今还是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也被介绍到苏联、美国和日本。作为文化的对外交流，话剧起了人民的使者的作用。

简略地回顾一下话剧的历史，对照建国以来话剧创作的道路，概括地说，就是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貌，自觉地执行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的二为方针。这就要求剧作家深入到生活中去，这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是根本不可能的。解放后，五十年代的剧作家才有了深入生活、刻苦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可能。剧作家们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创造出许多光辉的艺术形象，教育、鼓舞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政

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也较建国前执行得更为自觉了。

无论五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剧作家、只要是长期深入生活、能敏锐地观察生活中蕴育着的新旧思想的矛盾、捕捉典型的形象，必然成功地创造出艺术典型。李忱、丛深、刘川等几位的作品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创造的富有血肉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时代精神。八十年代的剧作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不是停止在表面，对我们这个背着五千年封建思想桎梏的民族，如何卸除精神上的锁链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付出了更多的思考，从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中间两位女作家白峰溪和沈虹光的成就值得重视。

党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我国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得出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方针。从建国之初的三大民主改革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领导人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的剧作家也历尽坎坷。由于对话剧事业的执著的追求和热爱，我们的剧作家在经过历次运动和十年浩劫后，有的笔力仍不减当年。对于那些五十年代就献身于话剧事业、今天仍战斗在话剧岗位上的剧作家们，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这是我国话剧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八十年代的年青一代剧作家，他们有的是带着伤痕投入笔伐“四人帮”的尖兵，正当他们的智力和体力需要丰富的营养的时期，却迎面扑来倾盆的暴雨，迷眼的风沙，一时间乌云漫天，辨不清方向，陷入极度的惶惑和愤懑。尤其当他们崇高的革命激情受到嘲弄之后，对“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的种种，包括自己的无知和天真，感到痛心。他们从痛苦中吸取教训，睁眼重新认识世界，回顾生活过来的经历，他们在思考，他们不再彷徨而要有

所行动，他们要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向全世界宣告。终于在“四人帮”覆灭前后，一批反映“文化大革命”题材的戏，首先出自一些青年作者之手，它们陆续揭开了话剧舞台新的帷幕。反映十年浩劫，写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话剧大量涌现，话剧舞台空前活跃。我们的剧作家在继承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吸收各种流派的艺术手法，从内容到形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勇于尝试、敢于创新，这精神首先应该予以肯定。

话剧艺术是现实社会的镜子，但又不应只起镜子的作用，它不但要反映出整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应该及时地传达出时代步伐的信息。剧作家应该在深刻揭示生活的意义和本质的同时，还要给人们以对生活前景的启示，使人们从娱乐中受到教育，有所启发和追求。这就要求剧作家们对生活能由表及里地进行观察、分析，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造出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通过剧中人物展开的矛盾，对主题的阐释也应能启迪、激励读者和观众。

有些经验，剧作家们通过新的创作实践作出了总结，作家们从新的艺术形象的创造，衡量出自己作品的得失，作为共同的教训，是否可以说是如何理解“二为”的问题。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素材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作品的主题是作者对社会上出现的矛盾的理解所阐述出的自己的观念。生活本身是复杂多样的，而生活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社会所产生的观念，必然要受到那时代的指导思想的制约。作家的观念和他所处的时代的指导思想之间有时会产生矛盾，如何不受时代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制约，而能根据自己学习到的辩证唯物观点来分析社会上存在的矛盾，从而创造出不仅当时需要而且能成为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这是对负有时代使命的剧作家们应有的也是最高